

记者是现代新闻从业者的通称。宋朝有邸报,没有新闻媒体,也就没有记者。请允许我借用记者即记录者的本意,介绍宋代最杰出的社会奇谈采访记录者,大学者洪迈。

传统笔记小说,大约可分为志人、志怪及博物考证几大类,其文本来源,一是剪裁前人著作,如《世说新语》《大唐新语》《唐语林》皆是;二是记录前人所谈,如《次柳氏旧闻》记柳芳传高力士的言谈,《松窗杂录》为李浚录早年听父辈谈论;三是道听途说,如《云溪友议》。当然也有闭门骋想,奇幻创作者,更是高手。宋初以来发生变化,部分笔记开始记录文本来源,或听某人所谈,或取资谁书,一一注明,大约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肇其端,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开其流——后者为写本朝史作前期准备,逐一备注来源,以便考核审定。南宋王明清《挥麈录》,也是这样的著作。

洪迈父洪皓,使金不屈,《四笑江梅引》尤著名。其数子皆博学能文,洪适专治汉碑,因他努力,宋人所见汉石文本大多得到保存;洪遵以编刻《泉志》《翰苑丛书》而为世所知;洪迈尤享大名,虽然他多达一百又八卷的文集《野处猥稿》没能保存,影响我们对他诗文成就的看法,但《容斋随笔》八十四卷,以博闻通达傲视一代,广得声誉。当然,还有更伟大的著作,就是四百二十卷的《夷坚志》,独立完成,篇幅接近《太平广记》。

洪迈称自幼过目不忘,在博通经史群籍时,也饱览“稗官虞初,释老傍行”,对各种歪门邪道

濠上漫与

抱有浓厚兴趣。开始采集怪奇传闻,始于二十岁时,到四十岁方完成二十卷之《夷坚甲志》,起步有些慢。此后时断时续,到七十二岁完成甲至癸十志,凡二百卷,采集故事二千七百零九则。他生命的最后十年,在退出官场归隐乡里后,倾尽全力,又完成二百二十卷,创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的奇迹。

将退未退之际,洪迈自述:“老矣,不复着意观书,独爱奇气习犹与壮等。天惠赐予我耳力未减,客话尚能欣听,心力未歇,忆所闻不遗忘,笔力未遽衰,触事大略能述。”老迈而耳力、心力、笔力都未衰减,好奇习气依旧,那就保持童心,不改本色吧。越老,他的工作效率越高,《支乙》历时八月,《支庚》仅四十四天即告竣,《支癸》则三十天收工,他自己也惊叹,“世之所谓拙速,度无过此矣。”

洪迈深谙“作诗火急迫亡道,清景一失后难求”(苏轼诗)的道理,他“每闻客语,登辄记录,或在酒间不暇,则以翼且追书之,仍亟示其人,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”(《夷坚支庚序》),这种工作态度,与现代媒体记者有什么不同?凡听到的各种奇谈,多数当时就拿出小本子记录,当然也有酒席上的谈论,记录不便,他是大官,是主人,场面上总要招呼,即便如此,次日早点起来,将听到的故事马上写出,让谈者再看一遍,有无

宋代好记者

陈尚君



洪迈(1123-1202)

不准确的地方。记者的工作流程如此完整,虽然年过七十,仍如此激情工作。

洪迈采编传闻,完全不计较讲者的身份,在他笔下既有周必大、范成大、陆九渊、吴棫等名人,也有蒋丞相、朱丞相等高官,更多的则来自“寒人、野僧、山客、道士、警巫、偃妇、下隶、走卒”,不计身份高低,职业雅俗,只要会讲故事,“凡以异闻至,亦欣欣然受之,不致诘”(《夷坚丁志序》),再好饭好酒的招待,有时不免还要留客付酬,都不在乎,能谈鬼说梦就行。张祝平教授著《夷坚志论稿》

(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),将洪迈所著书的文献来源作了详尽分析,可知早期多来自僚友官员之叙述,如王秬告二十七事,黄钧告十九事,邓植、邓直清父子告八十七事,晚年则多得民间人士叙述,如资福院僧显章、乐平游士孙千里、道士杨昭然、术士徐谦、居士徐熙载,甚至如福州老妪、尤溪坑户等。如徐谦为饶州占卜者,两目皆盲,但谙于历法、星占,为洪迈讲了四十三则故事。当然,洪迈一直没有停止阅读,前人著作中曲折离奇故事而不为世所知者,他也偶有改写发挥。他的名声大,也有民间人士鼓励他将沉寂不显的著作摘取以传,如乡士吴潦就出先人所著笔记,请他摘录,洪迈自称“剽取三之一为三卷”(《夷坚支庚序》)。各地友朋知他此一爱好,得到异闻,也会千里奉告,不认识者驰书奉料也不少。

其实,家人对洪迈的这一特殊爱好,并不支持。说来也是,高官退老,七八十的人了,早该优游林下,结侣云泉,早睡晚起,事佛修道,结三生善缘,或“熊经鸱顾”(《夷坚三丁序》),练练筋骨,干嘛天天请一些不三不四之人,作胡天胡地之谈,夤夜写作,“殆非老人顾神缮性之福”,对身体没一点好处。他家子弟不断罗嗦,他也想痛革前非,但仅几日,就发现“膳饮为之受味,走趋为之局束,方寸

为之不宁,精爽如痴”,浑身不自在,于是故态复萌,告诉子弟“故从吾志,以竟此生”(《夷坚支壬序》),这辈子只能如此打发了。

《夷坚志》书名来自《列子·汤问》,说鲲鹏之事,“大禹行而见之,伯益知而名之,夷坚闻而志之”,即怪奇之事,作者听到就写下来。洪迈是学者,对传闻有兴趣,始终只是忠诚的记录者,写定还要核实,多年后发现与事实有出入还加删订,这不是虚构创作的态度,也使他的著作达不到《聊斋》的高度。但因他不加选择的忠实记录,却如同《清明上河图》般地展开南宋下层社会的浩瀚长卷,民生艰辛,吏治腐败,民间信仰,日用百事,乃至淫巫敲詐,田产侵夺,谋财害命,孝道沦丧,节操松弛,欺詐百术,狱事惨酷,等等,都从下层人士口中讲出,在他笔下写定,无不具体生动。《夷坚志》是传统志怪笔记的异类,其叙述广度和深度超越了时代,虽然存世仅全书之半,仍规模空前,值得重视。

宋代官员待遇优裕,退闲后仍高俸优养,洪迈晚年能专心从事喜欢的写作,得益于此。另一个特殊案例是宰相周必大退归吉安后,组织地方学者校勘《文苑英华》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,使一批默默无闻的地方学者得以写下学术史上浓厚一笔。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,洪迈是一位成功者。

张祝平教授任教于南通大学,相识已久,但不知志业所长。偶在书肆得其书,置闲甚久,偶检而惊喜,既知洪迈之晚年敬业,不循时俗,更叹张著之分析精密,表述有识,故特为表出之。

马永卿(字大年)是两宋之交的著名学者,高邮人,著文常自称“维扬”或“广陵”人,或迳称高邮人。生卒年不详,只知其为大观三年(1109)进士,后在各地做官,地位都不算高。他的著作除了文集(二十卷),还有《元城先生语录》(二卷,附《行录》一卷)和笔记体著作《嬾真子录》(五卷,一般省称为《嬾真子》或《嬾真录》)。

学术性笔记《嬾真子》大约是历年陆续写出,内容约可分为当时的名人轶事与有关文史之学的札记短论。此书旧有《儒学警悟》本、《稗海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以及近人夏敬观校理之劳权整理本等;最近新见《嬾真子录校释》(崔文印撰,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,中华书局2017年2月版),后出转精,取读最便。

《嬾真子》在名人轶事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司马光的记载。马永卿的老师刘安世原是司马光的学生,关于司马光的故事大约正是马永卿从刘先生那里听来。马又曾在司马光家乡夏县当过地方官,认识司马光的后代,也得到了若干材料。

如卷一第一则《司马端明讲书》云:

温公之任崇福,春夏多在洛,秋冬在夏县。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。用一大竹筒,筒中贮竹签,上书学生姓名,讲后一日,即抽签令讲,讲不通,则公微数责之。公每五日作一暖讲,一杯、一饭、一面、一肉、一菜而已。温公先陇在鸣条山,坟所有余庆寺。公一日省坟,止寺中,有父老五六辈上谒云,欲献薄礼,乃用瓦盆盛粟米饭,瓦罐盛菜羹,真饭土簋啜土羹也,公享之如太牢。既毕,复前启曰:“某等闻端明在县日,为诸生讲书,村人不及往听,今幸略说。”公即取纸笔,书《庶人章》讲之。既已,复前白曰:“自《天子章》以下,各有《毛

诗》两句,今独无有,何也?”公默然少许,谢曰:“某平生虑不及此,当思所以奉答。”村父笑而去,每见人曰:“我讲书曾难倒司马端明。”公闻之,不介意。

司马光当过端明殿学士,学问很大,但坦然承认在《孝经》这样的基本典籍中自己也有未尝思考回答不出的问题。此是真学者的态度。这些都是极宝贵的材料,在正史中看不到如此具体生动的细节。

宋人喜欢谈学问,笔记性的著作中多有校勘考据一类的内容,又喜欢大发议论。《嬾真子》也讨论了许多经、史问题,而关于集部中的文学问题关注尤多。

如关于韩愈的《曹成王碑》,《嬾真子》有三则札记论及:卷二《曹成王碑以柴慎微本为正》《曹成王碑文用意深厚》和卷四《斐曹成王碑》,部分意见得到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的肯定。

马永卿读诗也颇有见解,书中卷四《杜牧之诗寓意》云:

清时有味是无能,闲爱孤云静爱僧。欲把一麾江海去,乐园园上望昭陵。

右杜牧之自尚书郎出为郡守之作,其意深矣。盖乐园园者,汉宣帝之寝庙在焉,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。牧之之意,盖自伤不遇宣帝、太宗之时,而远为郡守也。藉使意不出此,以景趣为意,亦自不凡,况感寓之深乎!此其所以不可及也。

今按,杜牧这首《将赴吴兴登乐园园》寓牢骚于平淡的叙事之中,颇得诗人意在

言外之妙。曾有多位诗评家论杜牧此诗,往往就“一麾”反复辩论其用典是否有误,而于全诗大局多置之不顾。马永卿指出,杜牧自伤不遇而以“望昭陵”曲尽其意,措辞甚妙。后有人发挥马说,指出“旧史云,牧自负才略,兄惊隆盛于时,而牧居下位,心常不乐。望昭陵者,不得志于时,而思明君之世,盖怨也。首言‘清时’,反辞也。”(释圆至《唐三体诗》卷二)实际上也是讽刺,意谓当今之世,无能者往往活得有滋有味,而真有才略者反而沉沦下僚。

《嬾真子》富于鉴赏意味的条目甚少,校勘考证的成分多,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论说:

……中间颇及杂事,而考证之文为多。如据《汉书》王嘉封事,谓《书》“无教逸欲有邦”,“教”当作“赦”。谓陶渊明《游斜川》诗“开岁倏五十”当作“五日”;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,传本误脱一韵,东坡亦误和九韵。谓杜甫诗“虬须十八九”,字出《汉书·丙吉传》。谓韩愈《感二鸟赋序》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。又考正《曹成王碑》衍文讹字及笺释句读。谓前《汉百官表》少府之遵官,据《唐百官志》当作导官。谓成玄英《庄子疏》不知其时已有县令,误读“县”为“悬”,解为高名令闻。谓古者席面之宾乃称客,列座之宾皆称旅,引《左传》为证。谓二十八宿中亢、氐、觜三星,《韵略》皆误音。谓赐脯始赵武灵王。谓“河鼓”之“河”当作“何”。谓《唐中兴颂》“复复指期”,“复

复”字本《汉书·匡衡传》。皆引据确凿,不同臆说。(卷一之一子部杂家类五)

上述涉及经史子集四部,马氏说得头头是道,且正如四库馆臣所说,都是正确的。兹就陶渊明《游斜川》诗马氏考订的一字多说几句,因这里的考订关系非常之大。

陶渊明《游斜川》诗首句“开岁倏五日”,“日”一作“十”,如作“十”,就可作为推算其生年的依据;而该诗小序第一句之“辛酉正月五日”,“辛酉”一作“辛丑”。陶渊明卒年是明确的—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“辛丑五十”与“辛酉五十”两种计算他享年多少的办法:

据“辛酉五十”,陶享年五十六岁(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二年壬申372——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);据“辛丑五十”,陶享年七十六岁(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——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)——这两种结论,与《宋书·隐逸传·陶渊明传》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的记载,即享年六十三岁(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——刘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)都不合。这令陶渊明研究者困惑多年,至今未能取得一致。

马永卿指出,诗的首句应作“开岁倏五日”。因此,此诗同推算陶渊明的年龄无关。他见到的一些本子,特别是庐山东林旧本陶集,都作“五日”。据此,则后来的种种纷争可打包取消,陶渊明生年仍依传统说法无变化。仅此一则,马永卿所著之《嬾真子》的价值就很高了!

马永卿和他的《嬾真子录》

顾农